



藏书纪事诗



书有模印，权舆于郑覃之壁经。迨唐长兴三年，国子监刻《九经》；汉乾祐二年，刻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；周显德二年，刻《经典释文》，而其风始畅。夫以线装代卷轴，便已；以镂板代写官，则更便焉。士大夫占诵，家置一编，省传录之烦，流播浸广。五季而后，亡书较少，繁雕本是赖。独是书经复刻，讹舛滋多，帝虎陶阴，所在皆是

[清]叶昌炽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藏书纪事诗

(清)叶昌炽 著
王锴、伏亚鹏 点校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书纪事诗/(清)叶昌炽著;王锸、伏亚鹏点校.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.5

(书目书话丛书;3)

2008年5月重印

ISBN 978-7-5402-1193-6

I. 藏... II. ①叶... ②王... ③伏... III. 藏书家-纪事-中国 IV. G251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4153 号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封面设计:揽胜视觉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9.25 印张 442 千字

2008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定价:78.00 元

前 言

《藏书纪事诗》七卷，清叶昌炽著。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纪事诗体为古代藏书家立传的著作。

叶昌炽(1847—1917)字鞠裳，晚号缘袈庐主人，清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。光绪二年(1876)举人，光绪十五年(1889)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翰林院编修，兼国史馆、会典馆两职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出任甘肃学政，升授五品翰林院侍讲。时值敦煌遗书被发现，曾建议藩台将遗书及有关文物运往省城保存，未被采纳，致使大批文物被劫掠至国外。科举制度废除以后，无意官场，称病归乡里，著述终老。

叶氏学问渊博，尤精于金石、版本、目录、校勘之学。少年时就读于正谊书院，是冯桂芬的入室弟子，并在冯氏任总纂的苏州府志局中担任公署、学校、坛庙、寺观、释道和职官六门分纂校核。一生喜收藏金石、古籍，蓄有碑拓八千通，庋于“五百经幢馆”，规模仅次于缪荃孙的“云自在龕”。在此基础上，撰《语石》十卷，计四百八十四则，分类叙述碑刻制度、书法演变、文字内容、摹拓鉴藏及其他有关石刻之事。于金石学贡献尤巨。叶氏也是一名藏书家，藏书约一千部，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，他收藏的宋元刻本寥寥无几，但他能独辟蹊径，自有其藏书特点。一是以苏州先哲遗书为收藏重点，苏州人著作三百五十余部，占其收藏总数的三分之一强，其中明代文集又占半数以上；一是叶氏的

自钞本，所钞必是罕见难得之本。其“钞功”极佳，六十五岁时，以半年时间钞成四百多页的《洽园诗稿》三十卷，甚至在他生命最后一年，还奋笔钞录《中兴纲目》十卷。后其家人将其藏书编成《治廬室善本书目》。叶氏藏书处曰“奇觚室”、“治廬室”，藏书印有“叶昌炽”、“昌炽”、“鞠裳翰墨”、“鞠常”、“五百经幢馆”、“八求三说一巧之斋”、“吴郡叶氏访求乡先哲遗书记”、“硕果堂”、“奇觚廋”、“缘督”、“陀罗居室”、“鞠常麋寿”、“长洲叶氏所藏金石文字”等。其所著《缘督庐日记》记载了从同治七年（1868）至民国六年（1917）四十九年间的所见所闻，可补史书缺载者甚多。

与许多文人一样，叶氏以其精湛深厚的目录学、版本学和校勘学功底受雇于人。先是协助蒋凤藻校勘蒋氏“书钞阁”藏书；光绪十年（1885）助其师潘祖荫编《滂喜斋藏书记》，每书详记行款、题跋、卷册数及藏书印，并兼记藏书家掌故，风格极似黄丕烈；又襄助广雅书局校刊古籍，为常熟瞿氏校正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晚年复受聘嘉业堂，校刻四史，毕生沉醉于典籍金石。

我国自秦汉以来即重视收藏典籍，自雕版印刷术发明后，公私藏书业得到迅猛发展，两宋以降，士大夫藏书者比比皆是，少则几千卷，多则几十万卷。若宋代王钦臣，藏书四万三千卷，宋敏求、田伟、赵明诚、赵宗绰、晁公武、楼钥、史守之、陈振孙等之藏书，均在万卷以上；元代赵孟頫、俞琰、陆友、苏天爵之藏书，也为一时之盛。明代学者藏书风气更盛于宋元，家资富足者又往往自己刻印书籍，因此明代私家藏书的总数大大超过宫廷所藏，如叶盛的“菴竹堂”、朱睦㮮的“万卷堂”、范钦的“天一阁”、毛晋的“汲古阁”、赵琦美的“脉望馆”、祁承燾的“澹生堂”等，均享誉全国。及至清代，私家藏书更是盛况空前，有名者若黄虞稷的“千顷斋”、钱曾的“述古堂”、徐乾学的“传是楼”、朱彝尊的“潜采堂”、富察昌龄的“谦益堂”、马曰璐的“丛书楼”、汪宪的“振绮堂”、翁方纲的“三万卷斋”、卢文弨的“抱经楼”、卢址的“抱经

楼”、周永年的“水西书屋”、汪启淑的“开万楼”、周厚堦的“来雨楼”、鲍廷博的“知不足斋”、吴騫的“千元别驾”、法式善的“梧门书屋”、黄丕烈的“百宋一廛”、陈鱣的“向山阁”、汪士钟的“艺芸精舍”、张金吾的“爱日精庐”、朱绪曾的“开有益斋”、郁松年的“宜稼堂”、潘祖荫的“滂喜斋”等，皆闻名当世。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下令各地进呈图书，马曰璐进呈家藏书七百七十六部，汪启淑、鲍廷博进呈六百余部，周厚堦进呈三百六十六部，均获嘉奖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或《佩文韵府》一部，为学界称道。清末四大藏书家，更是家喻户晓。杨以增的“海源阁”之藏书达二十余万卷，瞿镛的“铁琴铜剑楼”藏书达十余万卷，陆心源的“皕宋楼”藏书达十五万卷，丁丙的“嘉惠堂”藏书达二十万卷。历代藏书家多毕生节衣俭食，朝夕访求，视典籍为性命，受人齿笑，甚至被目为痴呆而弗顾，实难能可贵。凡此苦心孤诣，惨淡经营，其关乎一代文献之盛衰岂不巨哉？近世以来，各大图书馆琳琅满架，实乃先贤保护之功。诸藏书家既如此有功学术，其名不应泯灭，读者尤不当得鱼而忘筌也。然而，对于先哲们的藏书活动，却始终没有书籍给以表彰。有鉴于此，叶昌炽广搜博稽，发凡起例，著《藏书纪事诗》一书，专门为藏书家立传，使藏书家之功劳昭然于天下。

叶氏云：“昌炽弱冠，即喜为流略之学，顾家贫不能得宋元槧，视藏家书目，辄有望洋之叹。因念古人爱书如命，山泽之臞，槁项黄馘。吾吴如孙道明、朱叔英、吴方山、沈与文，皆名不挂于通人之口，缥緗既散，蒿莱寂然，可为陨涕。顾涧蘋先生尝欲举藏弃源流，汇所见闻，述为一编，稍传文献之信。窃不自揆，肄业所及，自正史以逮稗乘、方志、官私簿录、古今文集，见有藏家故实，即哀而录之。光绪丙戌以后，度岭而南，暨客都门，见闻稍广，篋衍遂充。初欲人为一传，自维才识鄙陋，丝麻菅蒯，始终条理之不易，乃援厉樊榭《南宋杂事诗》、施北研《金源纪事诗》之例，各为一诗，条举事实，详注于下。”初稿完成后，其师潘祖荫甚赏之，后其挚友江标录一副本，刻入《灵鹫阁丛书》，是本六

卷,错误很多,叶氏甚不满。他说:“写生迳录,亥豕之讹亦多沿而未削。”故刊刻《语石》既毕,遂取旧稿手自厘订。“旧例不录生存,断自蒋香生太守为止,今以续得九首,移原稿附录诸诗别为一首,都七卷。正史有传者,据史为次;有科目者,以释褐先后为次;无者,以其同时人序、跋、赠答参稽而互订之,诗注亦稍有增损,虽几尘风叶,未敢遂谓定本,粗可杀青”(《自序》)。又《缘袈庐日记》宣统元年(1909)四月初二日云:“至今日第一卷毕……前后两本,后人必致聚讼,自此本出,建霞所刊一本可置覆瓿矣。”同年六月十七日云:“《藏书纪事诗》编校毕,共六卷,不足廿万言。江刻亥豕尚不多,但原编未定之稿,次序凌躐,先后移易,颇费钩稽。开卷之初,惟恐旷月经旬,杀青无日,乃当兹杜门避暑,埋头伏案。一月功夫,全书居然告藏,非初愿所及也。以无时代可考者四家,一释一道、赠书、换书、买书、工估共二十首,又添写官傅释、周慈一首,另为一卷,共七卷。”由此可见是书成书定稿的概况。经其增订后,于宣统二年(1910)重刻于家,即传世本七卷本也。

《藏书纪事诗》是研究中国藏书家及藏书史的开山之作,也是叶氏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。叶德辉云:“往者宗人鞠裳编辑昌炽,撰《藏书纪事诗》七卷。于古今藏书家,上至天潢,下至方外、坊估、淮妓,搜其遗闻佚事,详注诗中,发潜德之幽光,为先贤所未有。即使诸藏书家目录有时散逸,而姓名不至灭如,甚盛德事也。”(《书林清话序》)又叶昌炽自云,是书“发隐阐幽,足为羽陵宛委之功臣”(《缘袈庐日记》卷四)。叶德辉评价诚为笃论,叶氏自言,亦非过夸也。综观全书,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:

首先,此书开创了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体裁。以私家藏书史实为题材,先为七言绝句一首,叙述其人的藏书特征,或抒写其人的心爱珍藏,下系人名,或系字号、谥号等,正文为博征群书所录的引文,必要时,加上案语。其典范格式为“领以绝句,缀以事迹,必要时殿以案语”。黄丕烈好宋板书,自号“佞宋主

人”，每得一奇书，辄请人绘图并征诗，如得宋刻本《孟浩然诗》，绘有《襄阳月夜图》等。又常至“读未见书斋”、“士礼居”举行祭书活动，可见好书之至。根据黄氏此特点，叶氏为诗云：“得书图共祭书诗，但见咸宜绝妙词。翁不死时书不死，似魔似佞又如痴。”下系“黄丕烈绍甫”五字。正文引《同治苏州府志》、王芑孙《黄茺圃陶陶室记》、沈士元《祭书图说》、顾广圻《士礼居祭书诗》、瞿中溶《题黄茺夫祭书第二图》等考其事迹，后附案语，言其所知黄氏得书图、字、号、室斋名等。另如范钦“天一阁”藏书，历时几百年，至今尚存，这主要是由于独特的建筑及严格的管理制度。“天一阁”取名即据“天一生水”的说法，取“以水制火”之义。其楼上贮书，楼下不贮书，便于防潮；书橱中置有防虫的芸草，楼前凿一水池，蓄水备用。后来，皮藏《四库全书》的文渊、文源、文溯、文津、文汇、文澜、文宗七阁，即仿“天一阁”式样而建。范氏家族对保管和阅览“天一阁”藏书制定了极严的族规，连范氏族人平时也极难登阁阅书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范氏后裔让黄宗羲登阁观书，这可算是破例相待了。有感于此，叶氏为诗云：“烟波四面阁玲珑，第一登临是太冲。玉几金峨无恙在，买舟欲访甬句东。”表达了对“天一阁”的向往之情。此诗下系有“范钦尧卿、从子范大澈子宣”十一字，范大澈乃范钦侄子，亦好藏书。正文引《明诗综》、《茶余客话》、全祖望《天一阁藏书记》和《天一阁碑目记》、《东斋胜语》、阮元《天一阁书目序》、郑梁《讷庵范公传》等，详述二人的藏书状况。后附案语，补范氏藏书印三十四方。每篇诗下所列藏书家，少则一人，多达八、九人。

其次，是书收录丰富，征引广博，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家及藏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。《藏书纪事诗》起于五代，迄于清末，共计四百一十六篇，收录七百三十多人。征引史料，自正史、方志、笔记、文集、诗集、墓志铭、书目题跋等，甚为广泛。如书目题跋，宋代有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尤袤的《遂初堂书目》等，明代有陈第的《世善堂

书目》、祁承燦的《澹生堂书目》、赵琦美的《脉望馆书目》、毛晋的《汲古阁书跋》、卞永誉的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等，清代有黄虞稷的《征刻唐宋秘书目》、钱曾的《述古堂书目》、徐乾学的《传是楼书目》、彭元瑞的《知圣道斋读书跋尾》、钱泰吉的《曝书杂记》、吴寿旸的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、黄丕烈的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张金吾的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、陈鱣的《经籍跋文》、朱绪曾的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、朱学勤的《结一庐书目》、孙星衍的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、瞿镛的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、汪士钟的《艺芸书舍宋元书目》、丁丙的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、丁日昌的《持静斋书目》、莫友芝的《宋元善本书经眼录》、陆心源的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和《仪顾堂题跋》、杨韶和的《楹书隅录》以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天禄琳琅书目》、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等，参考文献可谓富矣。每篇正文，通过引证大量文献，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了每位藏书家的姓名、字号、籍贯、生平简历、藏书特点、书斋名、藏书印、藏书目录及代表作，几乎相当于一部藏书家的传记辞典。同时，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集中地记录藏书家书斋名、藏书印的工具书。

第三，叶氏于征引史料时，多附案语。或补充史料之不足，或考证史料之真伪，或论藏书方法。资料不详者，于案语中或缺疑，或待考。这种科学的方法，值得今天整理古籍者借鉴。如卷四“张惟赤”一条，原因其世系不明，列入附录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重新修订时，适值张元济先生寄其先世螺浮世系，始知螺浮乃张惟赤号，惟赤长子名张皓，皓子名张芳湄，芳湄有子张宗松、张宗楠、张载华等，世代皆喜藏书。张宗松乃张元济之六世祖，故将此概况在案语中言之，并移列此条于卷四。又卷四“徐乾学”条，案语曰：“《传是楼宋元本书目》，吴次潇同年丙湘刻之广陵。秉义有《培林堂书目》，元文有《含经堂书目》。”此乃补史料未备者。卷一“王莘乐道”条，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云：“《雪溪集》八卷，汝阴王铨性之撰。国初《周易》博士昭素之后也。其父莘乐道，尝从欧公学，为曾纘婿。尝撰《七朝国史》，绍兴

初,诏给札奏御,会秦氏柄国,中止,书竟不传。其子明清,著《挥麈录》。叶氏案语曰:“性之之父,今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刻本作‘莘’。考叶石林《避暑录话》有王莘乐道,即其人也。‘伊尹耕于有莘之野,而乐尧舜之道。’其字乐道,当以作‘莘’为正,‘莘’字形近致误。”此乃辨史料之讹者。卷一“濡须秦氏”条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:“《秦氏书目》一卷,濡须秦氏。元祐二年,有为金部员外郎者,闻于朝。请以宅舍及文籍,不许子孙分割。”叶氏案语曰:“今世风俗衰薄,祖父遗书,子孙攘夺,往往各私扃钥,不容互观。钜册不能分者,甚至各据其半,其后卒不能为延津之合,良可慨叹。秦氏此举,法良意美,实为藏书者百世之师。独惜其名字翳如,为可悼也。”先祖藏书,子孙决不能分割,只可世代保管,方能传之久远,此乃藏书家应切记之善法。卷四“萧梦松”条案语曰:“其人本末不可考……则知萧氏为闽中藏书旧家,静君在康熙中尝游吾吴,但与御史辈行,先后未详。”卷六“王雨楼”条案语曰:“雨楼广文,道光间人,其年不在嘯山先生下,何以北面称弟子?或名世彦者别一雨楼乎?记此以俟考。”按,清乾嘉时,吴县有王干字雨楼者,乃吴志忠表兄;湖州有名王雨楼字广文者,二人均好藏书。另有名王雨楼字世彦者,即张文虎(号嘯山)所言者,时辈较前二人均后,叶氏不详,故缺疑待考。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,极为科学。

第四,叶氏对历代藏书家在校勘、刻印典籍方面的成绩及一些著名书籍铺的刊刻活动进行了表彰,肯定了他们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。清代的钱谦贞、钱曾、惠栋、何焯、全祖望、卢文弨、黄丕烈、顾广圻、严可均等人,不仅藏书丰富,而且好校勘古籍,终日丹黄不倦,凡经他们手校之书,多为善本。如何焯所校的两《汉书》、卢文弨的《仪礼注疏详校》及顾广圻所校的《仪礼》单疏、宋本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扬子法言》、《韩非子》等,多为后人称道。叶氏诗云:“不校校书比较勤,几尘风叶扫缤纷。误书细勘原无误,安得陈编尽属君。”赞顾广圻校书之精。建安余氏,自北宋以来,世代以刻书为业,刻书处曰“勤有堂”,

所刻《三辅黄图》、《绘图古列女传》、《仪礼图》、《千家注杜诗》等均为善本；宋代的尹家书籍铺，是临安府（今杭州）书坊，刻印书籍甚多，可考者有唐李复言的《续幽怪录》、宋徐度的《却扫编》、黄休复的《茅亭客话》、朱弁的《曲洧旧闻》等，所刊书有“临安太庙前尹氏书籍铺刊行”字样。宋陈起及其后人的陈解元书籍铺，刻有《李贺歌诗》、《孟东野集》、《中兴江湖集》、《王建集》等，所刻书皆有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印行”、“临安府棚北大街陈氏印行”字样。元建阳人刘君佐的“翠岩精舍”，世代刻书，延至明万历年间，计二百七十余年。清代学者，多以刊刻丛书知名，若吴志忠的《璜川吴氏经学丛书》、鲍廷博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、陈春的《湖海楼丛书》、孙星衍的《岱南阁丛书》和《平津馆丛书》、秦恩复的《享帚精舍词学丛书》、黄丕烈的《士礼居丛书》、张海鹏的《学津讨原》和《墨海金壶》、钱熙祚的《守山阁丛书》和《指海》、黎庶昌的《古逸丛书》、方功惠的《碧琳琅馆丛书》等，都在学术界享有盛誉，叶氏征引有关资料，对他们的刻书成就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若评《古逸丛书》说：“哀然巨帙，摹勒精审，毫发不爽。初印皆用日本皮纸，洁白如玉，墨如点漆，醉心悦目。流通古籍，嘉惠后学，与敝帚自珍者异矣！”

第五，叶氏不仅为几位女性藏书家立传，而且表扬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书商、写工及装订工等，足显其卓识。宋代以来，由于受宋明理学的影响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极为低下，男尊女卑，根深蒂固，至于妇女欲参加与男子一样的社会活动，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叶氏所录几位女性藏书家，多能助其丈夫，进行藏书活动，故加以称赞。若李清照，助其夫赵明诚收藏金石书画，每得一书，即共同校勘，整集签题，得书画鼎彝，亦共摩玩舒卷，指摘疵病。明归有光妻王氏，常助其夫访求书籍。清陆烜妾沈采，善书法，小楷隽秀，常为其夫钞写书跋，所钞书多钤有“虹屏”、“梅谷掌书画史沈采虹屏”等印。张蓉镜妻姚晚真，号芙初女史，喜藏书，精鉴别，藏有宋本《史记集解》等，藏书处曰“镜清阁”，藏书印有“一种心情是读书”、“姚氏晚真”、“芙初女史”

等。严元照姬张秋月，喜藏书，藏书印有“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”等。这些女性，尽自己所能，为古代典籍的流传做出了贡献，值得钦佩。清陶正祥、老韦、钱听默、陈驼子、侯驼子，皆为书贾，他们多识簿录，遇旧钞、旧刻，辄能言其写槧真伪、何年何人收藏、何省何地装订，极精鉴别，熟知版本源流。《四库》开馆时，属陶正祥访秘书，能称事，其又常助钜公宿学购书。钱听默，黄丕烈称为“书友中巨擘也”，严元照云其“善鉴别宋元板刻并法帖书画”。叶氏为诗赞曰：“不须刮目用金镞，根脚题签望不迷。此调书林今绝响，空烦重访白公堤。”这些人，正是古籍流传的中坚力量。

宋代毕昇，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。明华燧用铜字板刻书，华理制做的活字板更加精密，每得秘书，不数日即印出。叶氏称颂他们说：“范铜制出胶泥上，屈铁紫丝字字分。一日流传千百本，何人不颂会通君。”宋傅穉、明周慈、清许翰屏、孙二等，都是著名写工。傅穉善欧书，施宿刻《施注苏诗》，即其书写。周慈所写者有《论衡》、《六家文选》等。许翰屏是乾嘉时写工，以书法擅名于当时，黄丕烈、孙星衍、汪士钟、张敦仁影刻的宋本书，皆为翰屏手书。孙二以善写书根受人尊敬。明胡贸、清钱端正，是著名的装潢匠。黄丕烈家藏书之装潢，多出自钱端正之手。这些人是我国古代出版业中有代表性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，他们对于我国古代图书之流通、文化之传播，都是有辛勤劳绩的。叶氏在书中表彰他们，可谓有识。

《藏书纪事诗》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。有人曾说“仅此一部体裁内容都是空前的巨著，叶昌炽已足以立言不朽”（严佐之《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》第143页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）。此书问世后，对学术界影响甚大。类似著作接踵而出，如王謇的《续补藏书纪事诗》、伦明的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、徐绍桢的《广东藏书纪事诗》、吴则虞的《续藏书纪事诗》等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学者仿其体裁编成《上海藏书纪事诗》（见《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》）。

由于是书涉及范围广,征引材料富,加之条件所限,自然就不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。主要表现在:一是因失考致使人名误者。或两人而误为一人,如卷一毋昭裔、毋守素为父子而误为一人;或一人而误分为二人,如卷三蒋之翘即蒋石林、秦四麟即秦景阳,卷四蒋玠字绚臣等,均误分为二人;或载其名而失其字,如卷三沈启原字道初,高儒字子醇等;或载其字而失其名者,如卷一廖莹中名玉,卷五卢青崖名址等;或有名字俱误者,如卷五韩配基当是韩维镛字配賁;或有名误者,卷四浦起龙误作浦见龙,卷五吴春照误作吴春煦等。二是因失考其科第而编次颠倒者,如钮石溪为嘉靖进士而列潘曾纮后,伊侃为正统进士而附吴宽后,马森、陈暹皆嘉靖进士而附曹学佺后,程世铨、张思孝为师弟倒置,沈慈、沈恕为兄弟倒置,金元功为金檀侄而列于陆时化之下等。三是因材料所限而致误者,如卷三朱大韶篇,将“徐献臣字伯臣”讹为“徐献臣字伯忠”;何鐸篇,“仲容讳德润”缺“润”字;项笃寿篇,项笃寿印“圣师苗裔”遗“苗裔”二字;李如一篇,李如一本名“鸛舂”而误作“鹤舂”;赵宦光篇,赵均妻名“文俶”而误作“淑”等。此书从光绪十年(1884)编起,至十六年(1890)完成初稿,迟至宣统元年(1909)始修改定稿,因历时较长,故体例不尽一致。于所收人物,或称名,或称字,或称号,或名字合称,或称谥号、封号,不一而足,对读者极为不便。再如引用文献,不注卷次,所引文献,或用全名,或用简称,若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、《天禄琳琅书目》等。尚有手民之误,如卷三黄翼圣篇,戊子为顺治五年而误为六年等,但瑕不掩瑜(参蔡金重《藏书纪事诗引得序》、沈鹏《藏书纪事诗补正序》)。

关于《藏书纪事诗》的版本,最早者为江标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刻的《灵鹫阁丛书》六卷本,此本讹误较多,又非定稿,叶氏甚不满意。宣统二年(1910)叶氏自刻七卷本,前有王颂蔚于光绪十七年(1891)序。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叶氏家刻本重排印行,书前有《出版说明》一篇,书尾附录谭贞垣的《清代图书馆发展史》中有关《藏书纪事诗》的评介文字一篇,蔡金

重的《藏书纪事诗引得序》一篇,另有《人名索引》,依《藏书纪事诗》中藏书家名称和别号为条目,综合编制。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欣夫先生补正、徐鹏先生辑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本,书前有《出版说明》、沈鹏《藏书纪事诗补正序》。王欣夫先生精研版本目录之学,他针对叶氏原书的一些讹误、遗漏,经过数十年的积累,引用地方志、目录题跋、诗文集及笔记的材料,做了大量纠谬补缺的工作,提供了不少新材料。其《补正》系《藏书纪事诗》宣统刻本之眉批,经徐鹏先生整理成书。书后附有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索引》,本索引以叶氏原著中每首纪事诗条下所列藏书家名为主条目,据《藏书纪事诗》及《补正》内容,将字号别称、藏书处、藏书目、藏书印依次列于条下,甚便查寻,极为方便。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印行了马同俨先生的校注本。

我们这次点校,主要做了两项工作:一是以宣统间叶氏家刻本为底本,参校上海古典文学社之重排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王欣夫先生《补正》本,进行点校,对叶氏原文不加更动。此书内容多为引文,为与叶氏案语相区别,一律加上引号,全文用新式标点断句,并加以分段;引文与原书相校,多节略、并合甚至改写者,这是前人引书通例,概不出校;至于手民之误,则径改之;属明显错误而需辨正者,于篇下略作“校勘记”正之,并说明依据。二是对叶氏原书收录的七百三十多位藏书家、书贾等,根据相关材料,吸收当今研究成果,写一小传,附于每篇之后。小传内容包括人名、生卒年月、字号别称、朝代籍贯、科第时间、所任最高官职、藏书特点、藏书处、藏书印及代表作,重点介绍每人在藏书、校书、钞书、刻书方面的成绩,并详列藏书处及藏书印,不详者缺如。为读者方便及醒目起见,将正文中的人名,移于诗之上排列。

另于书后编制了《藏书纪事诗》人名索引,本索引以《藏书纪事诗》中所列藏书家姓名为条目,按姓氏笔画顺序编排。每位藏书家的字号、别称、谥号、封号、藏书处、藏书印及藏书目录,

不再另编索引,参篇后小传即知。

点校的具体分工是:卷一、二、三为伏亚鹏(伏麒麟、黄亚平、李占鹏,其中卷三的人物小传由王锔编写),卷四、五、六、七为王锔。王锔撰写了前言,编制了索引,并统一全稿。限于水平和条件,错误在所难免,望方家正之。

序

三代方策，遐哉邈矣！炎汉初兴，书皆竹帛。《班志》所谓“篇，竹书也；卷，则帛书也”。后世书不用竹帛，冒篇、卷之名，失其旨矣。《风俗通义》：“刘向典校书籍，先书竹，改易写定，可缮写者以上素。”盖西京之末，犹用竹为多，故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多脱简，而《班志》所载亦篇多于卷也。后汉宦者蔡伦，因缣贵简重，不便于人，以意造为纸，史称“莫不从用”。然考献帝西迁，图书缣帛，军人取为帷囊。吴恢为南海太守，欲杀青以写经书。是东京之世，纸犹不甚行矣。《抱朴子》自叙家贫乏纸，所写皆反覆有字。《世说》戴安道从范宣学所为，宣钞纸亦钞纸。然则废缣而用纸，^①其在魏、晋间乎？《书序正义》引顾氏曰：“策长二尺四寸，简长一尺二寸。”《聘礼疏》引郑君《论语序》：“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二尺四寸，《孝经》谦半之，《论语》八寸，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。”此古简策之制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宋武入关，收其图籍，府藏所有才四千卷，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炀帝即位，秘阁之书，分为三品：上品红琉璃轴，中品绀琉璃，下品漆轴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：“凡四部库书，皆以益州麻纸写。其集贤院御书：经库皆钿白牙轴，黄缥带，红牙签；史库钿青牙轴，缥带，绿牙签；子库雕紫檀轴，紫带，碧牙签；集库绿牙轴，朱带，白牙签。”此古

卷轴之制。夫笔行而书刀废，纸行而缣帛废，日趣便易，造述愈滋。故向、歆著录财万三千，至唐臣修《隋志》则凡六七倍焉。开元时，两京书库所储，则几十倍之焉。唐以前书皆写本，放失最易，故世传唐籍只有释氏写经，绝无儒家言。近独山莫氏得《说文·木部》，又日本涩江全善等《访古志》中所载卷子本甚夥，皆未可尽信也。

书有模印，权舆于郑覃之壁经。迨唐长兴三年，国子监刻《九经》；汉乾祐二年，刻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；周显德二年，刻《经典释文》，而其风始畅。夫以线装代卷轴，便已；以镂板代写官，则更便焉。士大夫占诵，家置一编，省传录之烦，流播浸广。五季而后，亡书较少，繁雕本是赖。独是书经复刻，讹踳滋多，帝虎陶阴，所在皆是。宋初，胄监刻经史，命儒臣校正，号称精审。然宋景文校监本《汉书》，中脱两行。岳倦翁称“监本经史，多仍五季之旧，与俗本无大相远”，则亦未为善本也。宋时官私刊刻，不胜倭指，监本外，大端约略可数。一曰家塾本，相台岳氏、剡川姚氏、瞿源蔡氏之类是也。一曰书棚本，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道人书籍铺、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之类是也。一曰州郡官刻本，宋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戎帅，皆有公使库，详《朝野杂记》。《朱子集·按唐仲友状》云：“据蒋辉供，断配台州牢城差，每日开书籍供养。去年三月，唐仲友叫上辉，就公使库开雕《扬子》、《荀子》印板。”又绍兴本《太平圣惠方》卷末云：“福建路转运司，今将国子监《太平圣惠方》一部，修改开板于本司公使库印行。”盖宋时州郡准用公使库钱，因就库开局刻书，故今时有台州、泉州、抚州公使库本。此外官本，或称漕台，或称郡斋、郡庠，凡不言公使库者，当是捐资自刻耳。南渡以后，所至郡府，多刊文籍。故吴明可帅会稽，独不传书，王明清以为异也。叶石林谓“福建本遍天下”，考今时所传闽本，以建安余氏为最著。有宋有余仁仲、余恭礼、余唐卿、余彦国，元有余志安勤有堂及双桂书堂。然元之勤有